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史料卷

往事回眸

中国福利会史志
资 料 荟 萃

中国福利会编

(下)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史料卷

往事回眸

中国福利会史志
资料荟萃

中国福利会编

(下)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回眸：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荟萃/中国福利会编. —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 12

(宋庆龄书系)

ISBN 978 - 7 - 5072 - 1701 - 8

I. ①往…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福利—组织机构—史料—中国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4065 号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往事回眸——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荟萃

编 者 中国福利会

主 编 顾琳敏

责任编辑 郑晓方

装帧设计 钦吟之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电 话 021 - 64373790

传 真 021 - 643737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上海叶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72 - 1701 - 8/D · 7

定 价 100.00 元

洛杉矶托儿所^{*}

王 颖

美利坚合众国有一座著名的城市：洛杉矶。

然而，在1993年的秋天，当金色的落叶飘然而至时，我带着3岁半的女儿，走进了一所幼儿园。那幼儿园大门的一侧，居然写着稚拙的童体字：洛杉矶托儿所。为什么中国的幼儿园却用美国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对于我、对于女儿，这都是一个谜。这个谜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已是1994年的春天了。我遇到了一位曾经在洛杉矶托儿所工作过的老保育工作者。从她的嘴中，我得知了谜底。

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既平凡、朴素，又美丽、动人，它深深地撼动了我的心。

毛泽东的苦恼

1937年延安枣园。

毛泽东又失眠了。

昨天晚上卫生处处长傅连璋找到他，向他汇报了延安缺药的情况，同时，还讲到了关于抗战将领的孩子问题，由于这些年轻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作战，他们的孩子无人照管，有的送到老乡家，有的送到亲戚家，但结果很不好，病死的、丢失的，屡见不鲜。这些孩子都是宝贵的革命后代，是否能搞一个保育院将他们集中收养起来？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推开了堆在书桌上的书本和笔墨，从笔筒中抽出一支铅笔，摊开一张稿纸，在上面重重地写下一个大字“药”，接着又在“药”字下面划了好

^{*} 洛杉矶托儿所，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美国洛杉矶爱国侨胞和国际友人捐助，通过宋庆龄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援在延安建立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王颖的连载文章，颇有史料价值。这里选登的是一、四两节，供研究参考。

几个圈。想起娃娃,毛泽东就心痛,毛毛,娇娇……贺子珍身体不好,孩子生下后带不了,便送到老乡家去喂养。娇娇离得近还好,经常可以去看一看。毛毛在中央苏区生下来,便寄养到一个老乡家中,至今没有找到,不知是死是活。毛泽东在烟灰缸中按灭了烟头,推门走出窑洞。

“呵,空气好新啊!”毛泽东舒展双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顿时感觉到全身有种轻松畅快的感觉。他轻松地扭动着身体,舒展着双臂,做着自己编的健身操。

“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毛泽东的身后有人问道。

毛泽东回过头,发现是傅连璋站在身后,他的双眼带着血丝,一脸的疲倦模样。

“怎么?你也没休息?”毛泽东关切地问。

“睡不着啊,事情很多,您不是也没休息吗?”傅连璋用双手搓了搓脸,学着毛泽东的样子,舒展着双臂,扭动腰部。

“是呀,我也与你同样的心情,事情太多了,躺也躺不下。”毛泽东做了一个弯腰动作,双手触到了地面。

“主席,我已与有关部门商量了,马上成立中央办公厅托儿所,现在已有7个孩子了,以后再陆续把送到外面老乡家的孩子接回来。”傅连璋说。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闪动着兴奋的光泽。

“好哇,好办法。不知有哪几个孩子?”毛泽东停下健身操,扭过头冲傅连璋问道。

“李维汉的儿子罗小金,贾拓夫的孩子贾丽丽,陈正人的小胖,谢觉哉的谢丁丁,王首道的女儿王苏云,我的女儿维芳,还有一个,就是您的女儿娇娇了,我看把她接回来吧,放在外面总是不放心,离得近些,随时可以看望。”傅连璋掰着指头说。“好哇,这件事,尽快办,是件大好事,我的小娇娇第一个报名。”毛泽东高兴地挥了一下手。“托儿所的所长选好了没有?”毛泽东又问。“选好了,派丑子冈同志去,她是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好同志。丈夫牺牲了,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延安,曾在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担任过护士,还担任过合作社主任,工作积极,吃苦精神强,对孩子很有爱心。”傅连璋说。“嗯,是个好同志。你昨天晚上没睡觉,是不

是去找人家谈话去了？你呀，也是工作上的拼命三郎。”毛泽东指点着傅连璋说，傅连璋不好意思地笑了。

“主席，另外，我还想派几位年轻同志去协助丑子冈，还要请一位做饭做得好的老师傅。”

“照你所说去办，这件事要办得既妥，又要快。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一定要把他们养育好。”毛泽东说。

中央托儿所易名

喜事，几乎是从天而降。

身居香港的宋庆龄女士将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们捐助的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几经磨难，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她在来信中明确表示：这些东西是送给孩子们的，包含了洛杉矶人民的一片深情。

宋庆龄女士运送来的孩子们的东西中，除鱼肝油精、盘尼西林、代乳粉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孩子们预防各类传染病的疫苗，这批疫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其珍贵，对于中央托儿所来说，它们胜过万两黄金。

有关部门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称为“洛杉矶托儿所”。让孩子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让友谊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为此，组织上准备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在会上宣布托儿所的更名。

1942年晴朗的冬日上午。

延安，兰家坪一座山坡上，“洛杉矶托儿所”命名大会正准备在这里召开。

会场设在托儿所工作人员们自己盖的大礼堂中，这是托儿所唯一最宽敞的地方。虽然这座平房盖得十分简陋，椅凳也十分寒酸，但会场布置的气氛很热烈。

中央托儿所大门处，新搭了一个高高的门楼，门楼上用松枝、野花装饰得十分漂亮，上面高悬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洛杉矶托

儿所”。

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正在忙忙碌碌地做着准备工作。丑子冈今天非常兴奋,那张往日苍白消瘦的面孔,今天变得红润了、有光泽了。刚刚修剪过的齐耳短发,透着勃勃英气。她今天穿了一身灰色粗布军装,腰间扎了一条宽宽的牛皮带,浑身上下打扮得利利索索。自从来到托儿所,她白天黑夜为孩子操心,最怕孩子生病,尤其是传染病。现在孙夫人从香港运送来这么多的物资,还有疫苗,真让她从心眼里高兴。

大会由卫生处处长傅连璋主持。中央首长参加了大会。

傅连璋讲了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的现实意义,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

“任宝珍,你说说,我们托儿所为什么改名叫洛杉矶托儿所?”傅连璋对着坐在台下的一位女保育员问道。

“这……因为,因为……为了感谢美国洛杉矶华侨及国际友人,感谢他们为我们千里迢迢送来了各种急需的物资。”任宝珍从座位上站起来,红着脸,想了想,回答道。任宝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人也文静,甚至有些腼腆,平常工作得很出色,是托儿所里的骨干力量。

“回答得好!”傅连璋满意地点点头。“任宝珍讲得很对,为了感谢洛杉矶的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为了记住他们的真诚帮助,我们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过些天还有一批美国朋友来延安参观,同时,他们也要到托儿所来看望孩子们,希望大家能做好各自的工作。”

孩子们黑压压地坐了一片,他们最大的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还需要阿姨们抱着。他们忽闪着眼睛,看着台上叔叔、阿姨们发言,他们大部分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人们总是在提“洛杉矶”“洛杉矶”的。大一点的孩子知道宋庆龄女士送来了大桶的奶粉、玩具和衣服等,但也搞不清“洛杉矶”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给他们换上尖尖的船形帽、厚厚的双排扣呢子大衣,甚至

还有漂亮的漆黑瓦亮的小皮鞋。

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在托儿所大门口、在礼堂、在操场,拍摄下不少照片。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的照片已经发黄变暗,失去了光泽,但它们仍被珍贵地保存着,有的还出现在 90 年代洛杉矶华人报纸上。

在宋庆龄女士送来的物资中,有一台大磅秤,这台磅秤成了托儿所的稀罕物件,由此产生了有趣的故事。

(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 年 2 月 27 日、3 月 1 日《神州周末》副刊)

——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7 年第 1 期

喜相叙

——从宋庆龄创办的第三儿童福利站到虹口区图书馆

丁景唐

我怀着喜悦和忆念的心情,前往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出席由虹口区文化局、虹口区图书馆召开的《10 大文化名人在虹口》专题室顾问筹备会座谈会。虹口区是上海现代文化名人荟萃的地区,也是现代文化设施比较齐全、文化活动和国际文化交流活跃的地区。去年,虹口区率先为区内的 10 大文化名人故居挂牌,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文化名人的业绩,作出努力,取得良好的成绩,现在又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征集文献史料,建立专库,集中收藏,供展出研究以及文化交流和普及宣传之用。实在是件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大好事,体现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为一名文化战线工作了多年的老兵,作为 60 多年前居住于斯的虹口少年,能和虹口区的文化主管同志们、各位学有专长的新旧识相叙一堂,出主意,想办法,我感到极大的喜悦。

今天,在乍浦路 245 号虹口区图书馆相叙,对我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引发起

我对半个世纪前,在乍浦路245号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工作时温馨的忆念。

半个世纪前,是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解放后改名中国福利会)选定昆山花园的一角——乍浦路245号辟为第三儿童福利站站址。它创立于1947年11月,到现在恰好是50周年。第一任站长为我国著名戏剧家于伶同志的夫人柏李(周尔贤),副站长陆子淳(解放后曾任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1948年秋,于伶和柏李撤离上海,去了香港,组织上让我从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教学岗位调至宋庆龄主席(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续任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我有缘多次见到这位为祖国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女性,衷心引发莫大的荣幸。

少年儿童的文化福利工作和妇婴保健工作是宋庆龄从事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她为帮助祖国花朵的健康成长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对祖国、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7年,宋庆龄先后在上海沪西的晋元小学、沪东的通北公园和虹口的昆山花园的一角创办了第一、第二、第三儿童福利站,为附近贫困的失学儿童和妇婴开展文化教育、妇婴保健和营养品的供应等儿童福利工作,得到社会的赞誉。

50年前乍浦路245号第三儿童福利站仅有一座半圆形的铁皮活动房子,附有一小间狭长的简陋棚房,总共加起来只有100平方米左右。工作人员不过八九个人,包括站长、教员、医生、护士等。但工作量甚大,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从清晨到傍晚,一批批的儿童到这里来读书识字、阅读图书、就医,贫苦的母亲带婴儿来看病,领取婴儿营养品。活动房子里充满着孩子欢乐的笑声,洋溢着教师、医务人员与母亲的温馨之情。还有儿童剧团(解放后改建为儿童艺术剧院)的教师和十几位儿童演员也在2/3的教室里进行排练活动。小小的空间和紧凑的时间巧妙地排列组合,在铁皮活动房子内,演奏出一支支美妙的少年儿童欢乐交响曲。

当时的政治环境已非常险恶,反动派垂死挣扎。宋庆龄主席有时还到儿童福

利站看望孩子们,关心他们的学习与健康。有次,她陪外籍医生来为师生查病,亲自担任翻译。冬日的阳光和煦地照出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庄严的风采。她以伟大的母性的爱,像冬日的阳光温暖着孩子们和教育人员的心身。

临近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抓紧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悄悄地教孩子们学唱《山那边呀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排演《朱大嫂送鸡蛋》小秧歌剧。其时,我因早在1947年春列入反动派黑名单,就转移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隐蔽于设在宅内的难童救济站。我与大场疏散来的山海工学团的难童们,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你是灯塔》,迎接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解放后,我回到乍浦路245号第三儿童福利站,兼任附设于245号的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虹口区中心工作站站长,党调戴辉同志任副站长,做我的助手,还调集十几位工会干部和义务人员(其中有三站的“小先生”),组织遣送流落在闸北、虹口、提篮桥3区的大量外地难民回乡生产自救。这项工作列为解放后上海的重点工作,同志们风里雨里、没日没夜,完成紧张繁重工作。(参看《我在宋庆龄老宅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刊《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6年6月第2期《纪念宋庆龄同志逝世15周年》特辑。戴辉同志现为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

在遣送难民工作的同时,师生们还紧张地投入慰问解放军和宣传工作。不久,我们动员一批“小先生”、“小护士”参军,欢送他(她)们入伍。当宋庆龄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消息传来时,师生们集会庆祝,欢呼雷动,连铁皮房子也几乎晃动起来。这是乍浦路245号小小福利站最兴奋的一天。

1949年冬,我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了孩子们和同事们,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在迎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几天,我又来到乍浦路245号虹口区图书馆门前,半个世纪前,昆山花园边上小小一长条简陋的铁皮活动房子已改建为占有半条马路的伟岸的6层大楼,100平方米的空间已扩展为3300平方米的包

括少儿图书馆在内,具有现代化各种设施的藏书30万册的虹口区图书馆,有各类对图书馆学有专长的人员50人。我伫立门前,凝视着乍浦路245号的门牌,联想翩翩,心潮澎湃。正乃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半个世纪之前,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她的事业竞放光彩,不断发扬光大。我想,无论在宋庆龄创办的第三儿童福利站工作过的战友,还是今天正在虹口区图书馆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我们应当继承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宋庆龄的光辉传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1997年8月25日

注:据戴辉同志告诉我,1949年冬,我离开第三儿童福利站后,1950年3月,在乍浦路245号福利站原址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儿童图书馆,5月5日正式成立。1951年6月扩大规模迁至北京西路1647号(胶州路口),8月1日开幕,乍浦路245号改为该馆的虹口阅览室,戴辉任主任。1952年12月为筹划少年宫,虹口阅览室也随少年儿童图书馆并入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又,解放前,第三儿童福利站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有60年代解放军的炮兵团长;著有《瞿秋白传》、《陈独秀传》、《郁达夫传》十几部著作的黑龙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观泉;著有《中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史》等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张学恕等。

——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7年第5期

谭宁邦谈中国福利基金会*

时间:1986年7月25日下午

地点: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会客室

访问人员:陈维博、任德耀、吴之恒、冯秉序、钱行健、戴辉

记录整理:戴辉

(钱行健首先提了以下几个问题:请问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联总的关系?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解总的关系?特种医药是怎么

* 谭宁邦曾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干事、中国福利会顾问。1972年回美国。这是他第2次重访中国福利会。

回事?)

孙夫人是1945年11月从重庆来上海的。我在重庆就认识孙夫人。我在1945年10月9日来上海,负责接管一个日本电台(在跑马厅对面)。因为在电台播送支持美国工人罢工的内容,我被认为是颠覆分子,被踢出。

1946年6月,在靖江路孙夫人家里和周恩来一起吃饭。周说服我帮助孙夫人工作,说帮助孙夫人就是帮助中国革命。我答应了。在这之前,我帮助孙夫人为募集文化福利基金,救济贫病作家、艺术家,在兰心大戏院举办音乐剧《孟姜女》的义演。当时刘厚生办了一个上海剧人福利会。

我正式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在1946年7月1日。在南苏州路175号颐中大楼,中国福利基金会有一间办公室。后来帮助孙夫人工作的有金仲华、耿丽淑、吴耀宗、沈体兰、杨素兰等。

在联总工作的哈励逊(今译夏理逊——整理者)医生,是加拿大劳动进步党人,他希望到解放区去。他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单位运送一批医药和其他物资去邯郸国际和平医院,结果在途中逝世。在上海开了纪念会,记得有个南斯拉夫的伏尼奇也参加的。当时报纸上登了消息。有张英文报纸《上海新闻》也登了。

新四军的沈其震到过南苏州路中国福利基金会,那天他化了装,穿得很漂亮。苏北淮阴的国际和平医院是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资助搞起来的。沈其震妻子的前夫是一位有名的奥地利记者,访问过解放区,曾向联总提出要求拨给解放区医药物资。1955年他去采访万隆会议,因所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而牺牲。

1946年,因为联总没有按照分配原则给解放区合理分配物资,许多在联总工作的人向联总提出抗议,有几百人签名,大多是外国人。

有一批特种医药物资,大约有300吨,其中有阿斯匹林、毛毯等。后来支援了10所国际和平医院,每院100张床位。这批物资通过赵朴初运送到了山东、大别山等地区。

解总上海办事处是1946年建立的,主要人员有伍云甫、林仲、纪锋等,地址是

在长乐路富民路口的一个弄堂里。

1947年4月10日《表》公演，儿童剧团正式成立。儿童剧团开始时只有张石流、任德耀。《表》演出后，报纸上有评论，说儿童剧团是“迎着朝阳的小舟”。

1946年，在胶州路成立儿童图书阅览室，由柯槐青负责。1947年成立第一儿童福利站。1947年10月10日成立第二儿童福利站。11月7日成立第三儿童福利站。一站站长，先是马崇儒，后来是陈维博。二站站长，先是陈维博，后来是王诏贤。三站站长，先是周尔贤（柏李，于伶的夫人），后来是丁景唐。

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儿童福利委员会，我们叫它“阔太太”会，她们只愿意支持儿童福利站，不支持儿童剧团。

联总在上海机构的领导人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关系还算好。

有一批美国教會的医生要到开封、邯郸去工作，但没有医药物资。后来由我押运、马云开车，把一批医药物资送到龙华飞机场运出。以后我们收到了邯郸的回执。

——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8年第2期

“小小国际会议”

顾锦心

1947年11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我进了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儿童工作组组长。

初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国际性。那时，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个个会英语，因为不懂英语，几乎无法工作。机关成员连主席宋庆龄，总共8人，其中3位是外国人。加上经常来办公室正等候基金会安排赴解放区工作的美国人寒春和新西兰人伊思平，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个机构的国际化。

我负责领导3个儿童福利站,工作内容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陪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参观我们创办的儿童机构,介绍我们的做法和成果,宣传我们工作的意义。前来参观的朋友很多,一批又一批,我全部用英语讲解。外国友人很欣赏我们的工作,也很乐意助一臂之力。有的捐钱、捐物,还经常有高级的外国医生来儿童福利站义务治疗。

总会每周举行一次工作例会,由宋主席亲自主持,听取汇报,研究问题,作出决定。参加会议人员全部讲英语,每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叫波西娅。每周一次的工作例会,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国际会议”。别小看这会议,作用可不小,8位成员,好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总干事谭宁邦,美国人,曾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通过他的努力,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争取到不少救援物资和药品。他作风民主,擅长宣传。他还能演戏,是电影《白求恩》中白求恩的扮演者。

英文秘书西尔维亚,美国人,是谭宁邦的得力助手,富于正义感,工作效率高,是当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小鲍威尔的夫人。

运输负责人王安娜是德国人,早年和王炳南在德国结婚后随夫来华。她在陕西的西安和延安居住多年,说一口地道的陕西话,经过解放区的锻炼和考验,能吃苦耐劳,交友广,个性强,胆大泼辣,常年一个人走南闯北,开辟运输线,负责长途押运物资。海关人员对这位外国女人都刮目相看。

中文秘书廖梦醒是廖承志的姐姐,她痛恨敌人,对同志特别热情。她通晓英语和日语,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宋主席和她的母亲何香凝情同姐妹,她是宋主席的可靠助手。

会计汪海清,责任心强,工作细致,办事稳妥。

战灾儿童义养会负责人张宗安,中英文都好,常为宋主席当翻译,为人活泼能干。

宋主席非常重视“小小国际会议”,每会必到,且很准时。开会时,她总是仔细

地聆听大家的发言,满意时点头微笑,发现错误决不轻易放过。那时候,儿童工作是汇报和研究的重点,因此我和张宗安的汇报总是安排在最后。凡遇到困难,无论缺物缺人,会后总能解决。“小小国际会议”效率高,作用大。

在当时极复杂的社会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国际性特点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运用别人的力量,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能量,这只有宋庆龄能够办到。

——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8年第3期

宋庆龄关爱伊思平

严福富

读了凌扬发表在《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总第21期上的《伊思平重访中国福利会》一文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仿佛看到《宋庆龄生平摄影展览》中那位身着制服站立在运输车前的金发女郎,又从珍贵的历史照片上款款走来,向我们讲述发生在51年前那段令她至今难以忘怀的经历。

由于研究宋庆龄的需要,我从中国福利会的永久档案里翻阅了大量史料。其中有一本颜色虽已泛黄但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卷宗,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巧,在这本卷宗里存藏的统统是伊思平当年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在煤油灯下,在炕沿上,写给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专题报告。从1947年12月30日她写出的第一份报告算起,到1949年8月29日写出的最后一份为止,在20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福利基金会收到她亲笔写来的报告竟达56份之多,共有170页。其中,1948年4月8日、15日、21日、25日和27日的5天中,每天竟要写2份报告,有一份写了整整17页。这就是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已双鬓染霜的新西兰的注册护士伊莎贝尔·汤普生女士留在中国、留在中国福利会的一份情愫。

伊思平是她在中国那段难忘的岁月里所起的名字。提起她的中国名字,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呢!在她重访中国福利会时,笔者曾不无兴趣地问她的中国名字有何来历,她先是笑了笑,而后认真地回答说:“向往和平呗!”

尽管流逝的岁月已有半个世纪了,但翻开伊思平写给中国福利基金会那一份份至今依然灼手的报告,人们不仅能感受到她那一颗向往和平、同情善良的心,而且更能深切地感悟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它的主席宋庆龄对伊思平的关爱之情。

伊思平,是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根据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协议,选派志愿者来中国服务的。在她刚刚踏上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在地上海不久,宋庆龄便以孙逸仙夫人的名义亲笔给当时的海关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们:

伊思平小姐是新西兰对外援助会派来中国担任护士。特此证明。

因此,请求贵海关对南京轮所载她的个人行李到岸时,予以放行。

诚挚的 孙逸仙夫人

这件事一直在伊思平的记忆中珍藏着,星移斗转,许多往事回忆不清了,唯独这件事她从未淡忘过。她说一位她所崇敬的人,在她来到异国他乡,就给了如此的关怀,这是她始料所不及的。就连这次相隔近半个世纪以后的重访,每每谈起这件事,她的目光里依然会流露出激动而异样的光彩。

伊思平在中国两年零6个月的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她在公谊服务会所属的设在河南的中牟医院,做训练护士和为农民做适应性的门诊治病工作。

1948年4月至6月,由河南省中牟到山西省长治县从事考察和调查研究。

1948年6月至1949年10月,她在山西长治国际和平医院工作。

1949年10月至1950年7月,应召返回上海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妇幼保健组,担

任行政领导助理。当时妇幼保健组正在上海女工中间开展保护产妇和幼儿健康的项目。

在华的28个月,伊思平无论身在何处,工作在哪个部门,始终牢记宋庆龄和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自己的深切关怀。

她永远也忘不了,在消息极端闭塞的环境里,是王安娜按时为她邮寄了她所需要的报纸、杂志;忘不了为了交往的需要,她曾从中国福利基金会得到过专门为她赶制的300张名片;她还忘不了她朝思暮想的那台英文打字机,就是由宋庆龄特批,通过总干事谭宁邦为她专寄的。宋庆龄对她的关爱,不断激励她去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并以同样的爱心回报给她所能遇到的患者和她所能接触到的乡亲。

这一点在她写给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一份份报告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她在许多外国人竞相撤离时来了

1947年12月30日下午3时,伊思平搭乘的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机飞离申城,在河南开封机场降落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捐助给国际和平医院的90箱医药物资也随她一同到达。

当她步出机舱走下舷梯时,出现在她眼前的竟然是这样一幅景象:男男女女的外国人大都行色匆匆,有的在办理登机手续;有的在向亲朋好友告别;而更多的则是向正在走下飞机的她投来了疑惑的目光。伊思平在给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第一份报告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可以想象,他们对我的到来感到惊奇,直到他们得知我是公谊服务会的成员后,才明白了一个孤单的外国人为什么在大家都竞相离开的时候,到达那里。”

伊思平和正在揣度她的人们友好地点头致意,穿过人群,风尘仆仆地向出口处走去。

她在给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报告中还这样写道:“在去中牟的路上,我进一步了